

評介杭廷頓著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張 豐 隆

一、前 言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 1993 年發表的「文明衝突論」引起廣泛的批評與討論，在 1996 年出版的十一／十二月號的「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他就此問題，繼續討論，寫就「西方文明獨特，但非四海皆準」專文，提出他對美國未來四年的外交政策與下個世紀世界觀的看法。

他在文裡首先評論「西方文化自然會成為世界性文化」是一個非常天真的看法，他舉出現在的世界超過百分之九十二的人不使用英文，回教的人口即將超過信仰基督教的人口等事實，說明西方的同化力正在下降中，而隨著整個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反西方的聲浪只會更高。

杭廷頓認為：要扭轉這個趨勢，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美國態度是一個大關鍵。但是他又認為美國不應該而且也沒有必要去維持四海同化的幻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文明，其責任首先在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在促進其他文明的利益。

他分析美國的態度與走向正受到三個力量所牽動著，其一，往南與拉丁美洲之融合有可能；其二，往西與東亞社會的融合則絕對不可能；其三，真正美國應全力以赴的則是應與歐洲同一來源文化的國家融合，藉著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相應的經濟紐帶，融鑄成西方文明與社會。

他特別注意到今天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想利用歐美間之歧異來離間，因而警告西方社會：「西方合則存，分則亡。」後來，他更據原先的論點，進一步地深入探掘各項爭議，而寫成為一本有系統的完整論著。在此書中，他不僅仍然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仍將主宰未來的世界政治，而且建基於不同文明的新

國際秩序仍是避免國際間戰爭的最好的保障。

從過去幾年間的重大事件正好證明杭廷頓的觀點。世界各地的人民愈來愈以祖先、宗教、語言及習俗來界定自己的身分。後冷戰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不是以意識型態或者經濟，而是以文化。目前，全球正依著文化的界限而進行重組，以一種新的合作與衝突方式來取代冷戰時期的方式。當今，最令人困擾的地方是位在文明的「斷層線」上，例如波士尼亞、車臣、高加索區、中亞、喀什米爾、中東、西藏、斯里蘭卡、蘇丹等地。

杭廷頓教授在書中解釋了回教人口的爆炸與東亞經濟的躍昇如何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性質。這些新觀念挑戰了西方一向的主宰地位，也質疑了一向被當做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西方理念。而今天在核武生產、移民、人數與民主等等的問題上，也愈見摩擦衝突。回教人口的急劇增加導致歐亞地區的戰爭不斷。中國大陸的強大也會有可能引發全球性的文明戰爭。於此情勢下，杭廷頓教授對西方文明應如何保存其文化的獨特性指出一條明確性，即應與歐洲文明相結合，他並且強調各地人民在複雜而多元的文明世界中應有學習共存共榮的必要。杭廷頓教授在這本書中，對世紀之交的各種力量提出了深刻而有力的分析，處處充滿了睿智而深刻的洞見。季辛吉稱本書為「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時也是「對二十一世紀全球政治架構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看法」。布里辛斯愈其更認為其是「大膽，想像力豐富，並且具有挑戰性的見解，對國際事務帶來革命性的看法。」

然而，杭廷頓教授是否就如此完美無缺，就如同他於書內的自序中所言：「沒有任何一種立論是永遠站得住腳的。」他的理論，也引來不少的批評，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即以爲：「杭廷頓教授的西方主體國際權力觀，力圖爲西方人保持視爲理所當然之優勢，說來或許只是他們傲慢之優越感受到了挑戰後引起之不安全感的自然反應吧！」並且以其觀點爲「偏執的歐美中心主義思想，不符合時代潮流。」¹ 本文，擬就杭廷頓教授的書之內容加以討論，並就其論點是否即如同葉啟政教授所言的缺失，加以分析。

二、內容概要

本書內容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爲：文明的世界；第二部分爲：變動中的

文明均勢；第三部分爲：文明的新秩序；第四部分爲：文明的衝突；第五部分爲：文明的未來。全書除自序3頁外，正文449頁。

第一部分：文明的世界內又爲三章：其各章標題分次爲：世界政治新紀元，歷史和今天的文明、世界文明？現代化與西化。在第一章內，杭氏認爲：在後冷戰世界，對大部分而言，文化的定位意義最重大。人不斷尋覓新的定位，結果發現似曾相識；他們在似新實舊的國旗下遊行，而且和一些新仇舊恨糾葛不清的敵人作戰。杭氏介紹狄卜丁 (Michael Dibdin) 小說《死礁湖》(Dead Lagon)，說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旨在探討文化和文化定位在後冷戰世界正在塑造分合和衝突的不同型態，依最廣義的解釋，文化定位即是文明定位。全書分五大部分，依次闡述由這個大前提之下所衍生之推論。第一部分：國際政治學乃有史以來第一次是多極的，也是多元文化並存的。現代化非西化，現代化也不能產生非西方社會式的西化。第二部分：西方影響力正在沒落；亞洲文明正在擴張其經濟、軍事及政治力；回教人口的爆炸會對回教國家及其鄰邦產生不穩定的影響。非西方文明正重新肯定本身的文化價值。第三部分：以文明爲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中。文化臨近性的社會彼此合作；想要把另一種文明改變成某種文明乃不可能。而不同國家正凝聚於領導其文明的核心國家周邊。第四部分：以西方世界觀者和其他的文明之間的衝突日見升高。尤以回教和中國最嚴重，地方層級的斷層線戰爭，大半產生於回教徒和非回教間。核心國之止戰計畫也逐漸擴大。第五部分：西方的存續賴於美國的重新肯定，而西方人也當接受自己文明的獨特性而非世界性，並應同結以抵抗非西方社會。爲免爆發全球性文明戰，各國領袖應能接受及合作，以維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特性。

自有人類以來文明不同者之間的接觸斷斷續續。自公元1500年後，全球政治大致區分爲兩大層次。四百多年來，西方的民族國家如英、法、德，在西方的文明架構上，形成了一個多極的國際體系，彼此之間，互動、競爭、及交戰。同時西方國家也不斷向外擴張、征服、殖民。冷戰時期，全球政治呈西極發展，世界分成三大集團；即以美國爲首的民主富國集團，和以蘇俄爲首的貧窮共產社會集團，展開全面性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以及軍備競賽。而這些衝突則大部分發生於兩大集團之外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些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多半貧窮、國內政治不穩定，且多半新近才獨立，自稱不結盟。

1980 年代底，共產世界垮台，國際間之冷戰走入歷史。在後冷戰世界，文化同時擁有分裂及聚合力量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道揚鑣的人民，卻可因文化而聚在一起。兩德及兩韓為現成的例子。因意識形態或因歷史環境而結合也會因文明而分裂，如前蘇聯、南斯拉夫或波士尼亞分裂成許多國家。不同文明間政治經濟發展的最大歧異，顯然根源於不同的文化。東亞各國的經濟成就根源於其東亞文化，可是東亞各國比較難建立穩定的民主政體，則以他和其文化難脫關係。回教文化亦是使大部分回教國家未能實施民主的根本原因。未來的數年，西方仍將是最強勢的文明，但其力量卻漸式微，尤其是正當和其他文明相對峙時。非西方國家文明將面臨抉擇。有些國家試圖模仿西方，有些國家則加入西方社會。其他儒家和回教社會則試圖擴大其軍事或經濟力量，以和西方抗衡。因而，所謂中央軸心或後冷戰世界之政治，就成為西方強權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互動。不同的文明，其政經發展的模式歧異，國際間重大議題涉及文明間的差別，權力正由西方長期獨霸轉向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全球政治已朝向多極化、多元化的發展。湯瑪士·孔恩(Thomas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認為：「要被接納為新典範，某一種理論似必比其他理論強勢，但不須要，事實上也永遠不能解釋它所可能面對所有的事實。」約翰·賈迪斯(John Lewis Gaddis)也說：「到不熟的地方找路，通常需要有某種地圖。」簡化的典範或地圖在幫助人類思考和行動上是少不了的。簡單言之，我們需要一既可以現事實，又足以簡化到最適合於我們使用的地圖。冷戰結束後，已經有幾張世界政治地圖或典範出現。

冷戰結束後的和平幻覺，因無數種族衝突的「種族淨化」而很快地煙消雲散。國與國之間有新的結盟形式但也產生新的衝突。聯合國及美國沒有能力鎮壓各地的血腥衝突，崛起的中國人越來越咄咄逼人。柏林圍牆倒塌五年後，滅種大屠殺(genocide)這個字出現的頻率，遠此冷戰期間任何五年還高。明顯地，在後冷戰的世界，寄望一個粉飾太平的模式來作為實用的指南是不均實際的。

冷戰時期，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依意識形態光譜分裂，但沒有單一的文化光譜。東西文化分裂，一部分源於一般通稱歐洲文明為西方文明這個語病，與其把這個世界稱之為「東方和西方」，倒不如直接稱之為「西方和其他地方」，至少這意味著很多非西方的世界並存。這個世界乃錯綜複雜的，不可能了滿足大部分

的目的，而簡單的在經濟上區分為南北，或在文化上區分為東西。

在後冷戰世界，國家越來越以文明條件來界定其利益，他們和有類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結盟，也比較常和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衝突。國際間也出現一種趨勢，國家政府逐步將權力移給次級政府及區域性、省級和地方政治實體。國家政府幾已難控制金錢流出和流入的能力，也難控制理念、技術、商品及人才的流失。簡單言之，國家的疆界越來越容易滲透，自 1648 年三十年宗教戰爭以來所簽訂的〈西發里亞條約〉(Treaties or Peace of Westphalia) 以來，可能存在的如「撞球」般堅實的國家逐漸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多樣、複雜、多層次的國際秩序，和中世紀的結構遙相呼應。

「混亂典範」凸顯後冷戰全球政局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以 1993 年年初為例，時全球總共發生了 48 起種族淨化戰爭，而蘇聯也發生了 164 件「邊界恐怖暴行和種族淨化衝突」，但這並不表示這世界完全失序，無助於了解世界，也無助於整頓及釐清世局並評估其重要性。

在冷戰初期，加拿大政治家皮爾森 (Lester Pearson) 指出非西方社會將崛起並展現蓬勃的朝氣。他也指出「影響最深遠的問題不再存於單一文明的國之間，而在不同文明之間。」冷戰結束後釋出他於 1950 年代所確認的文化和文明力量，不少學者和觀察家都認知並且強調這些因素在國際政治上所扮演的新角色。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曾睿智的警告說：「任何對當代世界有興趣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經扮演要角的人，應知如何從地圖上解讀今天全球的文明，才能界定他們的邊界、他們的地理核心和四周、他們的省市的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以及他們內部存在和想像的普通及特別的「形式」，否則，透視地圖可能會產生極大的問題！」（頁 3 至 31 頁）

第二章的歷史和今天的文明，杭氏首先界定文明的定義為：文明的概念濫觴於 18 世紀，法國哲學家爲了和「野蠻」的概念對照而發展出來的。其次，文明是一個實體。只有德國例外。第三，文明是包羅萬象的；第四，文明是會滅亡，但也可以延續很久，文明不斷進化調整。是「長久延續的歷史，文明事實上是源遠流長的史實」。第五，文明並未建立一套秩序或司法，也不涉及收稅、征戰、談判條約、或政府的其他一切施政。最後，學者在界定歷史上的主文明和現代世界所存在的文明時多半都能取得共識，但對史上到底有多少文明則仍有歧

見。如奎格利認為有 16 個主文明，另外可能還有 8 個；湯恩比說有 21 個明顯文明，後又修正為 23 個；史賓格勒說有 8 大文化；麥克尼爾則稱史上有九大文明。因此，杭廷頓教授認為當代主要文明依序為：中國文明 (Sinic)、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Hindo)、回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也許存在）。文明的關係經由兩階段發展，如今已進入第三階段。思想和技術從一個文明轉到另一個文明，通常要好幾個世紀才能完成。如佛教引進中國，是在發源於印度北部約 600 年後的事。

不同文明間偶發性或有限的多方位接觸，逐漸被西方對所有文明持續，強勢而單向的影響取代。

到 20 世紀，不同文明間的關係，已由單一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的單向影響階段，進展到一個文明密集、持續而多向互動的階段。在前一個世代，文明間關係的兩大特色也開始消失。其一，「西方擴張」結束，「反西方登場」。其次，國際制度擔及西方之外，而漸形成多元文明。西方所引發的文明內部的政治理念衝突，已為文化和宗教間的衝突取代。

每一個文明在記錄其歷史時，均自視其文明為世界核心，西方尤其如此。湯恩比曾痛批西方在「自我中心幻覺」中所表現的「偏狹傲慢」。之後五十年，布勞岱同樣力主擴大視野，並了解「世界重大的文化衝突，及文明的多樣性。」但這些學者警告說，這些幻覺和偏見在 20 世紀末仍然存在，且繼續擴大而成狹隘的自負，以為西方的歐洲文明現在已成為世界文明。（頁 33-60）

第三章：世界文明？現代化與西化。

杭氏解釋「世界文明」的意義，指的是意味著人類在文化上的聚匯，及世界各地人民越來越接受共同的價值觀、信仰、方向、措施和制度。其次，可以用來指文明社會所共有的城市、教育等特性，使有別於原始社野蠻人。第三、可能意指西方文明中很多人和其他文明某些人目前的假定、價值觀和理論。第四、一般認為，西方消費形態及全世界通俗文化的普及，正在創造一種世界文明。

全球傳播是當代最重要的西方強權表現。但這也促使非西方社會走民粹路線的政治人物宣斥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號召群眾保存其本土文化的存續和完整。

西方語言的使用走下坡，而本土語言則越來越強勢。語言依文明的認同和輪廓而重整及重建，語言也錯綜複雜。

世界上回教徒所占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新世紀末應達 20%，超過數年後的基督教信徒，也許到公元 2025 年，回教徒將占世界人口的 30%。

西方早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了。使西方有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色，早在西方現代化之前就存在了。西方歷史中有很多專制君主，經常罔顧法治，中止代議制。就個別因素而論，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所獨有的特色。但這些制度在西方遠比其他文明更為普遍，這也使得西方文化並非現代化，但它們也許是使西方帶頭促使本身和世界現代化的因素。

非西方文化社會，對西方的影響，至少以三種方式回應：拒斥現代化及西化；擁抱現代化及西化；擁抱現代化但拒斥西化。

現代化，不一定意味西化。非西方社會可以現代化，完成現代以後，未必要放棄他們自己的文化來全盤西化。相反的，現代化加強那些文化，並降低西方的強勢。基本方式上，世界越來越現代化，但比較少西化。（頁 61-95）

第二部分：變動中文明均勢。杭氏認為西方在 21 世紀的初數十年仍是最強勢的文明，之後西方仍可能科學人才、研發能力和民間及科技創新上大幅領先。西方對這些資源之控制在 1920 年代達到最高峰，此後便不規則的大幅走下坡。到西元 2020 年代，在控制領土上可能由占 49% 下降至 24%，社會上可動員人力從 48% 下降至 10%，世界經濟產值從 70% 下降至 30%，製造總產值從 84% 下降至 25%，軍力從 45% 下降至 10%。

「西方價值觀被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在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中國和日本都如此。」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廣泛表現於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復興上。尤其是亞洲和回教國家，拜經濟和人口成長之賜，其文化再生最明顯。麥克尼爾也指出：「最重要的是，對回教的再度肯定，不管其特定宗派形式的差異，意味著拒斥歐美對當地社會、政治和道德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非西方宗教的復興，是非西方社會反西方最有力的證。

東亞經濟發展正在改變亞洲和西方之間，尤其是美國之間的權力均勢。未來數十年亞洲經濟的成長，將對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程序造成極為震盪的效應。回教人口成長，對其鄰即也會成為一股不安定的力量。（頁 99-164）

第三部分：文明的新秩序。全國政治依文化重組。冷戰結束並未終止衝突，卻產生了根源於文化的新定位，並在不同文化團體間製造新的衝突模式，這在廣

義的層次，即為文明。共同的文化也鼓勵同質文化的國家和團體合作，這可從不同國家所出現的模式和地區性組合，尤其於經濟領域或可看出端倪。

即將出現的世界，貿易必會受文化模式影響。經濟合作源於文化的同質性。

政治領袖如目中無人，自以為能從根本上界定他們的社會，註定要失敗。相反地，西方病毒一旦寄宿於另一個社會中，就很難消除。

在全球政治中，各大文明的核心正取代兩大超強，成為吸引和排斥其他國家的主要磁極。文明集團由核心國家、成員國、鄰國文化近似的少數族裔，以及一些比較引起爭議的鄰國中其他文化的民族構成。

土耳其因為有其歷史、人口、中等經濟規模、民族凝聚力和軍事傳級及競爭力，因而可以成為回教世界的核心國家。（頁 165-243）。

第四部：文明的衝突。在即將登場的世界，不同的文明和團體間的關係不但不親近，往往充滿敵意。但有些跨文明的關係更容易引起衝突。從較小的層面上視之，最暴力的斷層線介於回教，及其正教、印度教、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鄰國之間。從宏觀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分界線是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間。爆發最強烈衝突的，一方是回教和亞洲社會，另一方則是西方。至於引發未來衝突的導火線，可能是西方的狂妄自大，回教的不容異己及中國的獨斷性。武力擴散伴隨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而生。當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經濟越來越強之際，他們的軍力也越來越壯大，回教國家也終將走上這條路，俄羅斯經濟改革如果成功，也將如法炮製。在後冷戰世界，發展大規模武器及發射裝置的計畫，主要集中於回教和儒家國家。

1993 年，美國政策中所界定的西方基本目標，從禁止核子擴散轉為反對核子擴散，這是在務實的認知某些核子擴散已到無法避免的程度下所作的修正。到公元 1995 年，美國和西方仍致力推動防堵政策，但終將註定失敗。核子武器的擴散，是一個多元文明世界緩慢但無法避免的權力分散下主要的現象之一。

一個由全民選出的中國政府，可能民族主義色彩很濃。西方領袖由於領悟非西方社會的民主進程往往會產生對西方不友善的政府，他們想要影響那些選舉，而對在那些社會提倡民主較不熱中。

如果人口統計學是宿命，人口移動就是推動歷史的原動力。過去幾世紀以來，不同的成長率、經濟情況和官方政策已造成希臘人、猶太人、日耳曼民族、

北歐人、土耳其人、俄羅斯人、中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大量遷移。韋納 (Myron Weiner) 曾說：「如果移民有任何『法則』可言，那即是移民潮一旦開始就源源不絕。移民提供他們在老家的親友移民資訊及其資源，來幫助他們移民，同時也幫助他們移民，同時也幫他們找工作和住處。」結果，形成一股「全球移民危機」。

不同文明間均勢的變動，使西方越來越難在武器擴散、人權及移民等問題上達成目標。要把這種情勢所造成的損失減到最低，需要西方在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軟硬兼施，技巧的運用其經濟資源以提高團結，並協調彼此的政策，使其他社會越來越難分化西方，並強化和利用非西方國家的差異。西方推行這些政策的能力，一方面將由西方和這些對立的文明之間衝突的本質和強度決定，另一方面則將由西方有決定性影響力的文明認同以及發展共同利益的程度而定。

文明的衝突是一場全球層次的部落衝突。回教世界正在發展一場「文明的冷戰」。其次，核心國家戰爭可能舉因於不同文明國際均勢的改變。

西方和中國之間權力均勢的移轉，由於缺少文化淵源，固然並未造成真正的武裝衝突，但可能性卻大為提高。回教的動力是很多仍在進行的較小型斷層線戰爭的根源；中共的興起則是核心國家之間一場跨文明大規模戰爭的可能引爆點。

回教國家未曾就反西方暴力進行示威抗議。另一方面，在美國向其回教敵人採取行動時，歐洲政府和人民多半表示支持，卻少加以批評；但在美國在冷戰間對前蘇聯和共產國家採取行動時，歐洲政府往往全力反對。文明衝突不像意識形態衝突；而在文明衝突中，物護其短，兄弟之邦不一定會站在同一陣線。

回教人民相信他們文化的優越性，並對其權威處於劣勢耿耿於懷，而西方人民也相信他們文化的普遍性，也相信也許正在式微而仍比較有優越的權勢，他們有責任擴張其文化到全世界。這些基本要素引燃回教和西方之間的衝突。冷戰勝利後，美國人傾向於亞洲人的價值觀和制度放諸四海而皆準，仍然有權力塑造亞洲各國的外交和內政。美國和亞洲的衝突源於文化上的差異，這些衝突之結果反映美國和亞洲權力關係的變動。美國和中共主要衝突在於彼此對東亞未來均勢的前景有基本的歧異。

中共的興起對日本構成嚴重的挑戰，而日本對應該採取什麼策略也莫衷一是。

不同文明和核心國家之間似乎正在發展的結盟和對立，仍有明顯的大趨勢可循。冷戰間比較簡單的兩極政治，已經被一個複雜的多極、多文明世界取代。

斷層戰爭衝突是不同文明國家或團體間的集體衝突。它也是充滿暴力的衝突，這類戰爭可以發生國家之間，非政府組織之間，或國家和非政府組織之間，斷層戰爭和其他族群戰爭固然有時間拖很久、高度爆炸、意識形態搖擺不定等特色，但也有兩大不同點。其一、斷層線戰爭似乎永遠發生於不同宗教信仰。其次，斷層戰爭本質上是分屬於幾個較大文化實體的集團之間的戰爭。

環顧回教世界的周邊國家，在 1990 年代，回教國家和他們的鄰邦都無法和平共存。回教徒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左右。但在 1990 年代，他們與不同團體發生暴力的頻率，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民嚴重。證據非常明顯。

要詮釋回教徒內部和外來衝突，有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因素，是回教世界缺乏一個或更多核心國家。最重要的是回教人口爆炸，15-30 歲之間很多未就業，這些皆是回教內部和對抗非回教團體時一股不穩定和暴力的自然來源。光是這個因素就足以解釋 1980 和 1990 年代回教暴力的起因。等到公元 2030 年，而回教社會的經濟如果發達之後，終將回教暴力大為減低，並因而使斷層線戰爭的頻率和強度普遍滑落。

斷層線戰爭的停戰協議只要能反映第一層參戰者的權力均衡勢和第二及第三層參與者的利益，即可成功，即使為時短暫。

窮兵黷武、不易消化和鄰近非回教團體，一直是回教的特色，也可以解釋有史以來回教的衝突傾向。

在後冷戰世界，多族群衝突取代超強的衝突。當這些集團衝突涉及不同文明的團體時，多半會擴大升溫。不管用什麼方式，海外移民和兄弟之邦都捲入 1990 年代的斷層線戰爭。1979 年起，前蘇聯和繼起的俄羅斯和南部的回教鄰國先後打了三場重要的斷層線戰爭：1979~1989 年的阿富汗戰爭；1992 年開始的塔吉克戰爭；及 1994 年開始的車臣戰爭。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一則希望和西方維持，擴大及受惠於良好的關係；一則又希望幫助塞爾維亞裔並能化解解放政治對手的怒氣。大體上，俄羅斯助塞爾維亞裔是不變的。波士尼亞內戰是文明戰爭。三個主要參戰者來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少部分外，第二層及第三層參與者完全符合文明戰爭的模式。回教國家和組織普遍支持波士尼亞回教

徒，反對克羅埃西亞裔和塞爾維亞裔。美國人總希望在任何外國人的衝突中，將其分為善惡兩大勢力，再和代表善良勢力的一方結盟。

· 斷層線「戰爭」時斷時續：但是斷層線「衝突」則是無止無休的。斷層戰爭並非由公正客觀人、團體或組織所結束，而是由有利害關係的第二層和第三層參與者出面。要中止一場「完整形」的文明戰必需有一些條件。如一、第二、三層參與者積極介入；二、第三層參與者談判廣泛的停戰條件；三、第三層參與者軟硬兼施，促第二層參與者接受條件，施壓第一層參與者接受；四、第二層參與者撤回對第一層參與者的支持；五、在如此壓力下，第一層參與者接受條件，當然也會在他們自認為符合本身利益時加以推翻。

種族淨化使塞裔人口減少不到克裔的3%，又波士尼亞的三大族群（塞裔、克裔和回教徒）經由暴力或自動劃分後，為和平增加了助力。第二層和多半為文明核心的第三層參與者，也必須和此戰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才會致力於謀求解決爭端。此外，停止戰爭和阻止戰爭的發生，端視世界各大文明核心國家的利益及其行動而決定。（頁247-417）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來。一個文明抗拒外來的破壞力和防止內部腐敗的能力，同樣重要。然而文明史最重要的教訓是：很多事可能發生，但沒有什麼事是無可避免的。西方文明到了1990年代中期，出現經濟成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偏低。自然人口成長率很低。重要的是道德敗壞、文化自殺和政治不統一的問題。除此之外，西方文明已經受到西方社會內部團體的挑戰。其中之一是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們拒絕同化。尤以歐洲的回教徒最為顯著，但他們只是少數，美國為數頗多的少數族裔拉丁美洲裔也有這種現象，但比較不嚴重。西方人對宗教信仰漸趨冷漠。20世紀，歐洲人覺得他們「要除了美國人承襲自歐洲人的罪惡傳統，並從非西方文化中求得救贖的源頭。」

美國人的立國元勳視多元化為一個事實，同時也是一個問題。但到了1990年代，美國領袖不只坐視其內訌的發展，甚至全力提倡多元化，而非力求民族團結統一。

西方是否會在政治經濟上與歐洲合流，主要視美國是否重申其身為西方國家的定位，並界定其全球的角色為西方文明的領袖而定。西方的泛世界論對世界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可能導致核心國家間爆發重大的跨文明戰爭，並且因西方可能

在戰爭中落敗而成爲西方的危機。

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國家都捲入全球戰爭，固然極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1950年代，皮爾林曾警告「在這個過分擁擠的小世界，另一個發展是誤解、緊張、衝突和災難。」在全球文明的衝突中，歐美可能攜手並進，也可能分道揚鑣。在比較大的衝突中，全球「真正的衝突」在文明和野蠻之差別。世界的偉大文明，在宗教、藝術、文學、哲學、科學、技術、道德和慈悲心上的成就斐然。但是，最後也可能是結合或分離。在即將到來的紀元中，文明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依據文明建構的國際秩序，將是對抗世界戰爭最有力的保障。（頁 421-449）

三、結 論

從以上所論，可見本書的特色爲：

一、可以說是屬於一種「反省史學」²。從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事實中，推測其理論，去發掘史實背後的真象，「從而進入對不同文化自相根源的相融性取得認識。」

二、自 1980 年起，世界各重要國家的政治領袖，還有各國大企業家、以及知名的學者所組成的三邊委員會 (Trilateral Comisson)，已逐漸掌控著全球的經濟活動，現在已逐漸擴及到政治的領域³。從這裡可看出杭亨頓教授的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看法，頗爲睿智。

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彰顯了科技的威力。從此科技成爲衡量國力的主要標準⁴。而杭氏在本書中也一再強調科技於目前的重要性，由於亞洲、回教的科技日益發展，但在文化上卻崇土抑洋。因而美國雖欲提倡西化卻無力且心餘力絀。

四、明顯地，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經營，西方現代理性邏輯事實上已滲透到世界各地的社會中，並且形成各地區的文化。於此情況下，東西雙方任何一方宣示要爭奪主導權，事實上是不可能，而且也不適宜的。杭氏是西方人，主張西方國家再度團結而再造第三春是可令人理解的。但察視當前之世界局勢與未來人類文

明的發展，是不恰當的，因為它的結果會使東西對立的局面更加深而惡化⁵。

五、21世紀將不會是任何一個中心為主的霸權的時代，人們應學習相處之道，應互相容忍異見，應注重妥協、應和諧共存，東西方應彼此互相尊重，才符合所謂的人道精神。杭氏之呼籲西方應與歐洲文明重組合，乃是仍然停留於以西方為主的過去時代，也許是基於歷史情結而引發的優越感作祟，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看來，對其命運已經逐漸衰退的豪門王孫，想要再一圖恢復昔日的風光，理應不是很容易的⁶。只有這世界的各地區、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寬容、互相和睦相處，世界和平的景像才會到來，人類的文明才會愈來愈進步，達到日臻至善的境界。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建國高中教師）

註 釋

- 1 葉啓政，〈偏執歐美中心主義思想，不符合時代潮流〉，〈亢龍有悔——對杭亭頓教授一文的一些聯想〉，中國時報85年11月25日，「時論廣場」，11。
- 2 鄧師元忠，〈反省史學初議——從中國史學發展的反省談起〉，《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三期抽印本，86年12月出版，頁69-82。
- 3 鄧師元忠於課堂上講課時所言，87年3月8日。
- 4 鄧師元忠，〈西洋現代文化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84年2月，頁425。
- 5 同註1。
- 6 同註1。